

布努埃尔的钟声

孙小宁

每年的四月，心底会竖起一个Flag，只等着北影节一声召唤：春天到北京看最好的电影！我便像北京的万千影迷一样，开始东城西城各个影院地穿越。好日子如流水，以为可以年年相续，却到今年，悬置起来。突起而绵延的疫情，让北影节的策划者都只能在网络上做视频直播。真应了那句台词：世事难料。

微博上看到有读书达人推介某经典，说这时候你再不拿起，恐怕以后也就没机会了。说得是啊，我也是趁此，把书架上的书，又扫了一遍。如果万事都停，只能宅居，能镇定并安抚自己情绪的，那便是读书了。但同样也是那一排排书，此时竟然也可以测出疫情的轻重缓急，实在是人的本能所致。疫情初起时，总是《逼近的瘟疫》那类书名瞬间跳入眼帘。再后来，戴口罩出门成了日常，视线就不往这类上落了。看碟也是如此。最先也都是《传染病》之类的灾难片，越到后来就总想看得越远越好。布努埃尔的电影与书就是这样放上了我的日程。但吊诡的又是，当我把一部印着他大名的影碟放进碟仓时，发现它是一部死里逃生片——《花园中的死亡》，也许根本算不进他的代表作序列，但此时，却像非常时期命运之手推来的神秘冲击波。

当然，今年观看他，也是有充足理由的。因为2020年，是他诞辰120周年，而他的生日又恰与我同天，都是日本人所说的猫日。这神秘的巧合，让我无端就想找到与他的丝丝关联。或许，双鱼座就是这么一厢情愿，敢于幻想。而书桌上，由商务的好友晓眉出版并赠予的传记《我的最后叹息》，到手后一直没读完。随手打开一页，就看到这段：“若是有人问，你还能活20年，在有生之年的每天24小时里你希望做些什么？我会回答：请给我两小时的活动时间和20小时的梦。”妥妥就是双鱼座式的漫漶。

真要起意做他的作品回顾，又得感谢多年延续下来的买碟存碟习惯。从新碟旧碟的重叠叠压中翻找出他的一叠，几乎能判断出来，都是年轻时凭着一腔大师崇拜攒下来的，时隔廿年，画质还清晰。有的后面还附有花絮，实是比网上单寻到资源要多一些惊喜。

作品全是不全，然而重要的几部都还在，决定依着创作年表往下捋。成色不一，但都是他的印记。从西班牙到法国、再从法国转战墨西哥。做了很长时间墨西哥公民，所以，一些重要的电影场景，都是在那片土地上拍的。

年轻时一出手就是《一条安达鲁狗》《黄金时代》这般惊世骇俗之作，但是，同一时期，他也拍了《无粮的土地》这样现实感很强的纪录短片。拍片经费还是朋友中彩票赢来的。

说布努埃尔是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，其实镜头下，并不都是白日幻梦似的场景。即便是盖棺论定的“超现实主义”，对他这样有着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的导演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也得回到他的创作语境里再看一看。“超现实主义的真正目标不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学和造型，也不是开创一种新的哲学，而是在于促使社会变革，

改变生活”。如此，他在同时期拍出哀民生多艰的《无粮的土地》，也是有其内在依据的。

由他亲口来总结回顾超现实主义理念，自然比各路理论家要更易理解得多，部分还因为，这是一位老人回首往事的口吻。人生永远大于艺术，一个平常再怎么觉得和自己情性不合、难懂难猜的艺术家，深入到他的生活轨迹，就都会觉得又懂了一些。不是懂艺术，而是懂人生、社会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。毕竟，他也是从20世纪起头，一路走过来的。欧洲大陆的风云激荡，他是亲历者，回到艺术史层面，他又是重要艺术运动的参与者。回忆录中对自己，他有私密的坦露，对别人，也有不遮掩的臧否。讨厌博尔赫斯而喜欢萨德，喜欢白日梦而讨厌过多的信息。就是自己的片子，也不都如数家珍。就是这样多一句少一句的讲述点评，也是其作品的最佳参照。记忆如萤火，于我们则是暗处的烛火微光，一点点接近他所制造的神秘。以为可以借此暂时逃离汹涌而来的疫情，渐渐发现它们也在帮我理解身处的现实。

布努埃尔的电影中，总有些无来由的卡顿。《毁灭的天使》中，明明周围没有遮挡，参加聚会的有头有脸的人，生生走不出那座大房子。到《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》中，则是赴宴者与邀人赴宴者，中间各种打岔、误会兼无厘头的行为与幻觉。一群人一次次走在田间大路上，堪称迷惑行为大赏。抛开他一贯的对某个光鲜阶层的冷嘲暗讽，这卡顿的行为本身，更接近一场场白日梦——布努埃尔自己也不暗示过：“梦中制造了我所了解的并能分辨出的种种障碍。”但现在，我却觉得再没有“卡顿”这个词，更能描绘疫情中的人类。自以为无远弗届的地球村，居然不再流动，各处的人们自我隔离，各自防护，虽然都在悲壮地为生存而努力，但在认识层面上却远没有达到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的同步。各式各样的卡顿：心理、文化的、医疗与行政层面的、医学观念上的，还有国与国之间的……有时让人急，让人疼，也让人无奈。

瘟疫，就是这样，把人类的痼疾，

再次暴露在前面。

而说到瘟疫，布努埃尔这么一个喜欢白日梦场景的导演，也是经历过上世纪的西班牙大流感的。我不知道谈话录中他说的“关于流行病、各种瘟疫的题材过去就吸引着我”，是否与此有关，但他的作品中，的确有和瘟疫相关的内容。

《纳萨林》，一部有着清水白墙似的黑白影调的电影。教士的故事中，有他沿途布道、穿越瘟疫地带、尽心抚慰病人的一幕。而当他尽心劝女病人向上帝祷告之时，女病人殷切呼唤的，却是远方爱人的名字。整部片中，教士的处境并不妙，沿途遭遇的尽是盘查，就连一路追随他的两个女信徒，其中一位回转家中，老妈洞若观火：你那是信仰吗？八成你是爱上他了。你一点不打算，信仰一下子被打入了凡尘。

“不过我现在明白了，对于一切来去匆匆的东西来说，上帝虽然是永存的，但常驻于物体之内不是上帝，而是爱；现在我懂得了如何从瞬间去品尝宁静的永恒。”安德烈·纪德之《人间食粮》，难道就是这位女病人的心声？

布努埃尔一生都在通过艺术处理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，但他的宗教题材电影，看了总是让人心绪莫名。所谓信者看其信，疑者看其疑，也就难怪，同样一部《纳萨林》，有些人认为它讽喻了教士们于现代社会中的困境，另一方面，宗教界又很想把荣誉证书递到他手上。

而我在观看他的《沙漠中的西蒙》时，那个爬上高高柱子的圣徒，总是让我莫名地想哭起来。

这些既严肃又滑稽的宗教角色，大概是在替布努埃尔承担他对宗教的疑问。但我又分明觉得他是被疑问里的玄秘吸引，进而想无尽探究下去。所以，那条通往圣地亚哥的《银河》之路，也暗铺在布努埃尔不同的电影当中，带领人们穿越历史与人类心灵的复杂面相，在途中探寻，论辩真理、信仰以及异端这样的精神存在。当他最终说出那句：“我是无神论者，谢谢上帝”，他其实是把自己搁置在这诸般矛盾当中。而他又进一步说：“我

在无数的矛盾中相当舒适地过了整个人生，我并不想化解这些矛盾。无数的矛盾是我自己的一部分，我本身也自然地具有捉摸不定的方面。”

忠实于自我体验、尊重想象，布努埃尔依此所创造的影像，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与他共振？常常奇怪，在我急急想补记那些值得回味的言词之时，并不能把它们尽还原到角色当中，准确说，和说话者对上关系。如《少女》中那句：日子一天天过，总会到头的。

要说疫情当中，到底哪一部布努埃尔片子更合于缓解焦虑，我觉得应该是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。也是墨西哥取景，整部影片都是浓烈的热带调子。鲁滨孙的装扮，初而绅士，后而丐帮，本身就是一个荒岛生存的渐进曲。再看他无师自通地织布、种庄稼、手作陶艺，简直就是一个男版的李子柒。不，比李子柒立体多了。美姑娘只展现岁月静好，而鲁滨孙还展现了人类的孤绝与诸多意识流幻相。配乐亦绝佳，营造出一种动感谐谑的人物步调，这使得海滩上陆现野人大脚印时，鲁滨孙那如见外星人般转身逃窜的身影，分外喜感。而独处孤岛，对着猫猫狗狗神神叨叨，在疫情当中看，太能理解了。华彩乐章是在圣诞节那节，借着酒酣耳热之际，鲁滨孙生生以意识流，撑起一出辉煌烛幕剧。这可考验演员功力啊。看完一查，果然，那个演员最后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。

布努埃尔电影中，能让人这样愉快而清晰地复述情节的不多，但这显然不是评定他这样段位的导演的指标。如果我在看完他一些片子后还有什么印象深刻，那就是教堂里的钟声。钟总是悬于高处，钟声起，镜头便是一个大特写：有晃动的钟摆，还有止步望向它的人群。

回到布努埃尔的人生回忆，他成长初期所生活的村庄，教堂的钟声总是和死亡相连。再到后来，给他留下无尽美好回忆的托莱多小城，也是处处能闻钟声。不禁猜想，无论是不是无神论者，布努埃尔终究是习惯并迷恋这钟声的，或许因为那是超过了语言的存在。

花絮碟中有一位电影评论家曾这样评价布努埃尔：“追求神秘，拒绝理性事物，拒绝贬低它们。……布努埃尔了解艺术家必须了解的那些东西，即我们的作品本身比我们所以为的丰富。产生自真诚和诚实的电影，总是比预想的深刻，超越了我们要表达的主题。我们必须尊重这一附加的深度，这一附加的深度可能成为与观众交流的契机。”

2020年，疫情当中，我在无数焦虑的夜晚，窝在被窝看他的电影，也像在努力捕捉这钟声所传递来的神秘信息。



笔会

见何时

(影像装置)

黄文亚

黑斑。

有时水泡变得太大，我妈会拿一根缝衣针在火上烧一烧消毒，然后帮我把手水泡挑破，说是给它引流。到后来我自己也会挑，不用我妈挑了。

这些叮人的虫子，也是当时支内的人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之一吧。

2018年夏，我和妻子回到遵义去重访四面山的3417医院旧址。去完之后，因为妻子是第一次到贵州，就和她一起去遵义附近的海龙囤，然后又到贵阳，还去看了青岩古镇和黄果树瀑布。一路上都没有碰到跳蚤和小咬，连蚊子也没有来叮过我们。

最后一站是贵阳花溪公园。花溪我之前也没有去过，但是闻名已久，所以这次想到要去看看。进入景区之后，觉得果然名不虚传，有水有水，有花有溪，溪中还有多级小水坝，造成层叠的堰塘，真是风光旖旎。

然而，不久我就发现，因为水面多，蚊虫也多。不久就有黑色的蚊子，对我发起了疯狂的攻击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只极小的虫子，影影绰绰地在我身边飞舞。原来小咬也来了！

尽管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，不停地挥动手臂，还打死了几只大胆的蚊子，最后还是中招了，不但被蚊子叮了还被小咬叮了，尤其是两臂肘后的部位，因为那里是视线不及之处。蚊子和小咬也是很狡猾的啊！

被蚊子和小咬叮过的地方起了很多包，尤其是被小咬叮过的地方，回到上海后还痒了一两个月，而留下的黑斑，过了一年才褪掉。

我的贵州经验又回来了！

《走窑汉》是怎样「走」出来的

刘庆邦

《北京文学》是我的“福地”，我是从这块“福地”走出来的。1985年9月，我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了短篇小说《走窑汉》，这篇小说被文学评论界说成是我的成名作。林斤澜先生另有独特的说法，他在文章里说：“刘庆邦通过《走窑汉》，走上了知名的站台。”汪曾祺先生也曾对我说：“你就按《走窑汉》的路子走，我看挺好。”

我的老家在河南，1970年7月，我到河南西部山区的煤矿参加了工作。我一开始写的小说，在河南的《奔流》和《莽原》杂志上发表得多一些，一连发表了八九篇吧。时在《北京文学》当编辑的刘恒，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，写信向我约稿。我给《北京文学》写的第一篇小说《对象》，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1982年第12期。大概因为这篇小说比较一般，发了也就过去了。但这篇小说能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，对我来说是重要的，难忘的。我认为《北京文学》的门槛是很高的，能跨过这个门槛，对我的写作自信增加不少。刘恒继续向我约稿，他给我写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。他在信中说：“再一次向你呼吁，寄一篇震的来！把大旗由河南移竖在北京文坛，料并非不是老兄之所愿了。用重炮向这里猛轰！祝你得胜。”刘恒的信使我受到催征一样的强劲鼓舞，1985年夏天，在我写完了短篇小说《断层》之后，紧接着就写了短篇小说《走窑汉》。写完之后，感觉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大一样，整篇小说激情充沛，心弦紧绷，字字句句充满内在的张力。我妻子看了也说好，她的评价是，一句废话都没有。这篇小说我没有通过邮局寄给刘恒，趁一个星期天，我骑着自行车，直接把小说送到了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。那时我家住在建国门外大街的灵通观，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，我家离编辑部不远，骑自行车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。因为那天是休息日，我吃不准编辑部里有没有人上班。我想，即使去编辑部找不到人也没什么，我到长安街逛一圈也挺好。我来到编辑部一间比较大的编辑室一看，有一个编辑连星期天都不休息，正在那里看稿子。而且，整个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。那个编辑是谁呢？巧了，正是我要找的刘恒。我们简单聊了几句，刘恒接过我送给他的稿子，当时就翻看起来。一般来说，作者到编辑部送稿子，编辑接过稿子，会说，稿子他随后看，看过再跟作者联系，不会立即为作者看稿子。然而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，刘恒没有让我走，马上就为我看稿子。他特别能理解一个业余作者的心情，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。刘恒在一页一页地看稿子，我就坐在那里一秒一秒地等。他看我的稿子，我就看着他。屋里静得似乎连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。我心里难免有些打鼓，不知道这篇小说算不算刘恒说的“震”的，亦不知

算不算“重炮”，一切听候刘恒定夺。在此之前，我在《奔流》上读过刘恒所写的小说，感觉他比我写得好，他判断小说的眼光应该很高。小说也就七八千字，刘恒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看完了。刘恒的看法儿是不错，挺震撼的。刘恒还说，小说的结尾有些出乎他的预料。我的小说结尾出乎他的预料，刘恒的做法也出乎我的预料，他随手拿过一张提交稿子所专用的铅印稿签，用曲别针把稿签别到了稿子上方，并用刻刀一样的蘸水笔，在稿签上方填上了作品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。

1985年9月号的《北京文学》，是一期小说专号。我记得在专号上发表小说的作家有郑万隆、何立伟、乔典运、刘索拉等，我的《走窑汉》所排列的位置并不突出。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，对作品排在什么位置并不是很在意，看作品也不考虑作者的名气大小。对于文学杂志上出现的新作者，大家带着发现的心情，似乎读得更有兴趣。

小说发表后，我首先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反应。王安忆看了《走窑汉》，很是感奋：“好得不得了！”她立即推荐给上海的评论家程德培。程德培读后激动不已，随即写了一篇评论，发在1985年10月26日的《文汇报书周报》上，评论的题目是《这“活儿”给他拒绝了》。程德培在评论里写道：“短短的篇章，它表现了诸多人的情与性，爱情、名誉、耻辱、无耻、悲愤、复仇、恐惧、心绪的郁结、忏悔、绝望，莫名而无尽的担忧、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、甚至生与死，在这场灵魂的冲突和较量中什么都有了。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了，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写得也太棒了！”当年，程德培、吴亮联袂主编了一本厚重的《探索小说集》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小说集收录了《走窑汉》。后来，王安忆以《走窑汉》为例，撰文谈了什么是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，并谈到了推动小说发展的情感动力和逻辑动力。说实在话，在写小说时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。王安忆的分析，使我明白了一些理性的东西，对我今后的创作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。

北京方面的一些反应，我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听到的。有年轻的作家朋友告诉我，在一次笔会上，北京的老作家林斤澜向大家推荐了《走窑汉》，说这篇小说可以读一下。1986年，林斤澜当上了《北京文学》主编。在一次约我谈稿子时，林斤澜告诉我，他曾向汪曾祺推荐过《走窑汉》。汪曾祺看过一遍之后，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。林斤澜坚定地对我说：“你再看看！”汪曾祺再次看过，林斤澜打电话追着再问汪曾祺对《走窑汉》的看法。汪曾祺这次说：是不错。汪曾祺问作者是谁的，林斤澜说：不清楚，听说是北京的。汪曾祺又说：现在的年轻作家，比我们开始写作时的起点高。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会上，林斤澜把我介绍给汪曾祺，说这就是刘庆邦。汪曾祺像是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，伸着头瞅我佩戴的胸牌，说他要验明正身。林斤澜说：别看了，《走窑汉》！汪曾祺说：《走窑汉》，我知道。

可以说，是《走窑汉》让我真正“走”上《北京文学》，然后走向全国。将近四十年来，我几乎每年都在《北京文学》发作品，有时一年一篇，有时是一年两篇。在《北京文学》创刊70周年之际，我专门统计了一下，迄今为止，我已经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了35篇短篇小说，5部中篇小说，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，还有七八篇创作谈，加起来有60多万字，出两本书都够了。

走窑汉，是对煤矿工人的称谓。我自己也曾走过窑。煤还在挖，走窑汉还在“走”。我持续不断地写作，与走窑汉挖煤有着同样的道理。“走窑汉”往地深处挖“走”，是为了往上升；“走窑汉”在黑暗里“行走”，是为了采掘和奉献光明。

2020年1月20日至22日于北京和平里

小时候，我被虫叮了会起比较大的反应。我最早的记忆（没有之一），就是我被人抱着——可能只有一两岁大——然后手上被蚊子叮了，起了一个圆滚滚的水泡。我很恨这个水泡，就用食指和拇指去掐，想把它掐破。

一般被虫叮了反应小的人，也就刚被叮的时候会起个包，稍稍痒一会就不痒了，包也消退了。我则不然。先是会痒痒，然后起包，起水泡。有一两次夜间被蚊子叮在了眼皮上，结果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整个眼皮肿了起来，眼睛被眼屎封住。还好被叮的总是只有一只眼睛，不然就看不见东西了。

后来去贵州，去到我爸妈在遵义附近山区里支内工作的3417医院，让我见识到了贵州叮人的虫子。

上海当然也有蚊子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每年初夏的时候里弄里还会搞“爱国卫生运动”，往阴沟和潮湿角落喷药杀虫，所以蚊子相对少一些。

贵州的蚊子可能跟人类打交道相对较少，所以笨一些，比较容易打死，但数量上可比上海的多多了。有一种强壮的黑蚊子，头尖尖多的，像战斗机一样，闻到人的味道就直扑过来。还有一种比较较弱的灰蚊子。当时好像还没有现在常见的黑白相间的花蚊子。

我们那时住的7号楼是医院的宿舍，居室和厨房虽都是单独的，厕所却是公用的。每一层楼住四户人家，走廊当中有一个水冲桶式厕所，里面分隔成数间。厕所里面因为有水，蚊子特别多，走进进去就能看到有许多

蚊子，跳蚤和小咬

——一个支内者家属的回忆（二）

谈瀛洲

在飞，还有许多停在墙壁上，等着在你蹲坑时冲过来在你屁股上、腿上叮一口。每个单间里面的墙壁上，累累的都是被如厕的人打死的蚊子，但总也打不完。

当时家里一开始还没纱门纱窗，晚上睡觉要钻蚊帐。我睡前我妈总是仔细检查蚊帐，因为即便是躲了一只蚊子，也会被它叮好几口。但小孩子睡相不好，有时睡觉时滚到床边，手臂或腿脚挨着蚊帐，也会被蚊子隔着薄薄的帐纱叮上好几口。

后来有了纱门纱窗，就感觉好太多了，平时在家，不用担心被蚊子叮。当然进出门的时候还得要当心，不能把蚊子放进家里。

贵州还有一种会叮人的讨厌虫子，是上海没有的，那就是跳蚤了。这跳蚤原来是钻在别的动物的皮毛里吸血的，有时也会栖身于泥土里、草丛中，人如果正好走过它附近，它就会跳到人身上，也算是换换口味吧。像我这样在乡野里流浪的小男孩，整天在草丛里跑来跑去，牛棚、猪圈旁也会去，就常常会有跳蚤跳到我身上了。

它有时钻到袜子里，有时跑到裤腿中，如果是跳到你身上的话，多数时候会落到你裤腰那里，在衣褶里钻来钻去，顺便叮上你二三十口。

如果发现我身上跳了跳蚤，我妈就会让我把衣服全部脱掉，拿到室外去抖，把跳蚤抖掉。她眼睛比较尖，还逮住过跳蚤，身体扁扁的，只有芝麻大小，掐死也很费力。我妈有一双对外科医生说很重要的好眼睛，中年时双目视力还是1.5。

跳蚤的烦人之处就在于它一到你身上，不会只叮你一口，而要叮上几口、几十口。它这么小的身体，装满血也没多少，不懂它为啥要叮人这么多口。

第三种叮人的虫子是小咬，也是上海没有的。我只被小咬叮过一次，但是印象深刻。

记得有一次医院里的卡车运来了一车沙子，卸在宿舍楼附近。这沙子一时也没有被用来造房子，在那里堆了一段时间。

沙子是小孩子最喜欢玩的东西之一了。有一天近黄昏时，我正在沙滩

上玩，挖山洞、堆碉堡、开公路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这时眼角边就瞥到有些很小的虫子在我周围飞舞。

这虫子实在太小了，眼睛也看不太清楚，我就没在意。结果回家吃饭时，就浑身奇痒起来，起了几十个包！后来听人说，这种小虫当地人叫小咬，虽小却叮人厉害。（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它还有个比较正式的名字，那就是“蠓”。）

被虫叮了以后怎样呢？痒是不用说的，而且不能挠，越挠越痒。被贵州的虫子叮了以后，痒得也特别久。然后起水泡。一般是一个圆圆的水泡。碰上特别毒的虫，会在被叮的包上先起许多个小水泡，然后这些小水泡不断涨大，最后连成一片，变成一个大水泡。

水泡会越变越鼓，上面那层皮会越来越薄，直到透明，然后有一天终于涨破，里面的汁水流出来，那就是这个包快好了，快不痒了。然而还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难看的黑斑，要过一两年才会完全褪去。一个夏天下来，我腿上、手臂上会有许多这样的